

语言迁移视角下汉语概念对英语习语理解的影响 ——以某高校英专生习语理解为例

詹琪, 倪锦诚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以英汉习语跨概念对比框架为基础,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考查汉语概念对我国高水平英语学习者习语理解的影响及其理解不同习语时所采用的策略和迁移情况。结果表明: 1) 汉语概念对英语习语理解具有显著影响: 当汉英概念基础相同时, 理解语言形式相同或相似的习语易产生正迁移, 而理解语言形式不同的习语会产生正迁移或负迁移; 当汉英概念基础不同时, 理解语言形式不管是相同、相似还是不同的习语均会产生负迁移; 2) 理解语言形式与母语相同或相似的习语时, 受试者不直接采用借助汉语策略; 理解语言形式、概念与母语不同的习语时, 受试者倾向于借助汉语。学习者应该多利用汉英概念来学习和掌握英语习语, 把握习语迁移规律有助于二语学习者学习习语时不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关键词: 语言迁移; 汉语概念; 英语习语理解

中图分类号: H 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5)03-0241-08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30313111](https://doi.org/10.13256/j.cnki.jusst.sse.230313111)

Chinese Concepts' Influence on Comprehending English Idi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Transfer —A Case Study of Idiom Comprehension by English Majors

ZHAN Qi, NI Jinch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contrastive model for Chinese and English idioms,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Chinese concept transfer on comprehending English idioms by advanced Chinese EFL learner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ir strategies for comprehending different idioms as well as the language transfer that occur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hinese concept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learners' comprehension of English idioms. Positive transfer occurs when learners comprehend the English idioms which have the same concept and the same or similar linguistic forms in Chinese, while both negative transfer and positive transfer might occur when learners comprehend English idioms of the same concepts but different linguistic forms. Negative transfer occurs when learners understand idioms of different concepts, no matter whether their linguistic forms are the same, similar or

收稿日期: 2023-03-13

基金项目: 2021年上海市社科规划年度课题(2021BY008)

第一作者: 詹琪, 女,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E-mail: dc729839050gak@163.com

通信作者: 倪锦诚, 男, 教授。研究方向: 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E-mail: jcnnews@163.com

different. 2) When understanding idioms of the same or similar linguistic forms in Chinese, learners do not directly adopt the strategy of “borrowing Chinese”. When understanding idioms that have both Chinese different linguistic forms and concepts, learners tend to resort to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should learn English idioms by mean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concepts. In addition, understanding the rules of idiom transfer can help L2 learners avoid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Keywords: language transfer; Chinese concepts; comprehension of English idioms

习语作为一种特殊的程式语,一直以来都是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领域的热门话题,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习语被视作约定俗成、结构固定、变异限定的组词组和惯用搭配^[1],它们不仅大量出现在本族语者口语和书面语表达中,还对增强二语的准确度和连贯度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正确理解和使用习语,对一语和二语的习得都十分重要。

一、文献综述

习语字面义、比喻义和整体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增加了习语语义理解的难度,而二语习语理解通常要比一语习语理解更为困难。这是因为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二语习语的熟悉度和使用频率都有所下降,且二语学习者往往缺乏理解习语所需的隐喻知识。Abel^[2]基于Kroll等^[3]的双语语义表征系统提出了双向习语表征模型。该模型认为二语者更多地依赖习语各成分词的意义和双语概念进行加工。造成二语习语理解困难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二语者在理解习语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母语的影响,这体现了语言的负迁移现象。语言迁移是一种“跨语言影响”,包括母语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和母语向二语的借用^[4]。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迁移既会发生在语言形式结构上,又会发生在与这些表层结构密切关联的底层概念结构上,因此母语在语言结构和概念形式上都可能影响二语理解。

二语与母语之间的类比是迁移产生的原因^[5]。研究发现,母语与二语习语之间的相似性会产生语言正迁移^[6],而母语与二语在表达方式和概念意义上的差距又会促使二语者回避使用习语^[7-8]。Cooper最早采用有声思维的实验范式研究英语学习者的习语在线加工策略,总结出准备策略和猜测策略两大策略^[9]。此后,不少学者基于类似的语

言和概念对比模式考察了母语和其他因素对习语理解的影响^[10-15]。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习语迁移现象研究。由于汉英隶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语言之间的差别较大,汉语对英语习语理解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语法结构层面。因此,国内学者在研究母语的影响时,除了考察语言形式的影响,也考察了英汉语言背后的文化和思维差异的影响。例如,林维燕在其汉语文化对英语习语理解影响的研究中,将英语习语分为表达和意义与汉语成语均完全相同的习语、表达和意义与汉语成语相近的习语、表达与汉语成语相似或相同而意义不同的习语、没有对应汉语成语的习语4种类型,结果发现受试者理解不同文化差异的习语情况大不相同^[16]。吴旭东等在对中国学生习语理解研究中,将习语类型和二语水平作为自变量,基于概念基础/文化内涵和语言表达,分别建立了跨概念和跨文化的英语习语对比分类框架。该框架同时基于英汉对比体系和习语的可分解观,因而可用于指导英语习语分类,结果发现语言表达、母语概念和文化均会影响二语习语理解^[17]。吴旭东的另一项研究参考Cooper的有声思维法^[9],调查了中国学生理解英语习语时使用的策略^[18],不过该研究中受试者及用于测试的习语数量均较少。唐玲考查了二语水平、母语等因素对中国大学生习语理解策略使用的共同影响,得出二语水平与习语类型交互影响习语理解的结论^[19],这与吴旭东等的研究结果^[17]基本一致。上述研究大多为策略研究,均采用语言和概念异同的对比模式考察母语概念或者母语思维对英语习语理解的影响。

分析认为,前人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1)在选择习语时,大多数研究只考虑英汉两种习语整体意义之间的异同,忽略了习语本身的可分解度及其熟悉度带来的影响,导致研究结论不一;(2)针对习语理解策略,前人研究大多采用有声思维范式对受试者口头报告结果进行定性分析,

采用问卷对策略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和定量分析的研究则较少;(3)在对策略进行划分时,前人多从猜测和准备策略两大角度展开,未从是否借助母语这一角度来考察策略的使用。鉴于此,本研究采用测试和量表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研究,将英汉语言形式和概念差异作为习语分类的依据,以进一步考察二语学习者理解英语习语的过程。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和受试者

本文主要有3个研究问题:(1)汉语概念如何影响英语习语的理解?(2)不同类型习语的理解策略有何差异?(3)学习者在理解哪类英语习语时会产生正迁移,在理解哪类英语习语时又会产生负迁移?为什么?

研究受试者为65名上海某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受试者报名前需要填写问卷,确认他们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间参加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并取得TEM8证书或已知自己通过TEM8考试。在本研究中,成绩在70~80分之间(M=72.1)的受试者均被视为高水平英语学习者。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测试和量表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内容包括习语理解测试和李克特5级量表调查,具体调查形式参考吴旭东的研究方法^[18]。

其一,习语理解测试。考虑到习语本身的熟悉度和可分解度可能会对习语理解造成影响,本研究首先依据叶琳的相关评定表^[20]挑选出可分解度和熟悉度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备用习语90个,再按照吴旭东等提出的英汉习语对比框架^[17]将这些

习语划分为5种类型(T1-T5)。具体划分过程由不参与实验的另一组英语水平相当的20名英语专业学生和3名外语教师共同完成。外语教师中有1名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外教,担任某英语专业本科班的口语教学任务,另2名为英语专业任课教师。首先,这20名同学对每个习语进行判断,剔除意见一致度在90%以下的习语,剩下的习语再由3位教师进行讨论,最后挑选出40个习语作为实验材料,并进行分类,每类习语8个(部分习语见表1)。受试者需要用中文写出各个习语的意思。

其二,量表调查。受试者每填写完8个习语就需要对涉及理解这些习语所使用的策略陈述进行同意度选择,量值为1(完全不同意)至5(完全同意)。关于二语习语理解的策略,Cooper^[9]和谭利思^[21]在他们的研究中总结了几项常用策略,包括利用二语习语的字面意义、根据常识猜测、借助母语概念等策略。本研究主要考查汉语概念对于习语理解的影响,因而将这些策略归纳为不借助汉语(3条)、借助汉语(4条)及其他策略(2条),共3类,量表调查中每类习语后面都包含9项策略陈述。

(三)研究步骤

进行测试和调查的前3天,研究者先向10名研究生和5名本科生发放测试卷和调查问卷进行先导测试和调查,结果反馈良好。正式测试和调查由研究者和一名教师共同完成,该教师向受试者发放问卷,问卷包括测试题和量表。正式测试和调查之前,研究者先解释了测试和调查目的,确保受试者在理解相关情况后填写问卷:受试者需先在问卷上用汉语写出英语习语的意思,每完成8个习语,勾选随后的习语理解策略陈述等级。整个测试和调查过程均在研究者的监督下完成,期间受试者不能相互交流或者查阅资料。

表1 基于跨概念对比框架划分的习语

Tab. 1 Idioms classified based on the cross-conceptual contrastive model

习语类型	语言表达	概念基础	英语	中文	熟悉程度	可分解度
T1	相同	相同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出身高贵	3.01	2.49
T2	相似	相同	waste one's breath	浪费口舌	2.27	2.16
T3	不同	相同	spill the beans	泄露秘密	1.93	1.88
T4	不同	不同	shoot the breeze	闲聊	1.67	1.71
T5	相同	不同	turn the tables	扭转局面	2.18	2.31

(四) 数据统计和分析

1. 数据收集

习语理解情况由受试者理解各类习语的得分来体现。对于每个习语，受试者完全写错/空白得 0 分，答案模糊/接近正确意义得 0.5 分，意义完全正确得 1 分。测试题共包含 40 个习语，每类 8 个，因此受试者每类习语理解能得到的最高分为 8 分。习语理解过程由受试策略使用情况来体现。受试者填写每个习语的意思后，需要完成习语下面的 5 级量表调查。每种策略使用情况可以勾选 1~5 中的某一数字，研究者最终对所得数值进行定量分析。

2. 研究结果

本研究最终共收回有效问卷 62 份，之后按照习语理解测试得分及量表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推断性统计。

(1) 汉语概念对习语理解的影响

研究者首先对受试者的各类习语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5 类习语的均值分别为 6.331、4.903、3.056、2.435 和 2.450 (表 2)。除了第一类习语，另外 4 类习语得分均值均不高，尤其是第四和第五类习语，可见英语习语理解对英语学习者来说比较困难。第一类习语 (T1) 和第二类习语 (T2) 得分最高，第四类习语 (T4) 得分最低。

表 2 各类习语得分均值

Tab. 2 Mean scores of all types of idioms

习语类型	均值	标准误差
T1	6.331	0.181
T2	4.903	0.286
T3	3.056	0.339
T4	2.435	0.326
T5	2.450	0.283

随后，研究者用 SPSS 27.0 对相关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F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显示，不同概念基础的习语得分差异显著 ($F=37.441$; $P<0.001$)，即汉语概念显著影响英语习语理解。

表 4 显示的是 5 类习语得分两两之间的对比结果：(1) 第一类、第二类习语与第三类、第四

类、第五类习语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值越来越大，前两类习语得分显著高于后三类习语；(2) 后三类习语，即第三类、第四类和第五类习语得分相互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3) 第一类和第二类习语间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表 3 各类习语得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Tab. 3 One-way ANOVA for scores of all types of idioms

项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显著性
组间	771.182	4	192.796	37.441	$P<0.001$
组内	1 570.560	305	5.149	—	—
总计	2 341.743	309	—	—	—

表 4 习语间两两对比分析结果

Tab. 4 Pairwis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idioms

类型对比	平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	显著性
T1—T2	1.427 [*]	0.338	0.000
T1—T3	3.274 [*]	0.383	0.000
T1—T4	3.895 [*]	0.373	0.000
T1—T5	4.081 [*]	0.336	0.000
T2—T3	1.847 [*]	0.443	0.001
T2—T4	2.468 [*]	0.433	0.000
T2—T5	2.653 [*]	0.402	0.000
T3—T4	0.621	0.470	0.679
T3—T5	0.806	0.441	0.363
T4—T5	-0.185	0.431	0.993

注：*表示 $p<0.01$ ，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类习语和第二类习语为概念基础与汉语相同的习语。这两类习语得分显著高于后三类习语，是因为其英汉概念基础相同，受试者很容易激活与母语相关的知识来理解习语。而这两类习语得分差异显著，说明语言结构相同或相似会对受试者理解习语产生一定的影响，结构完全相同更有利于受试者直接借助母语进行理解，正确率更高。相反，第四类和第五类习语为概念基础完全不同于汉语的习语，其中第四类习语得分最低，因为其语言结构和概念基础均与汉语不同，即使受试者将习语直译为汉语，得到的结果也往往是错误的。第五类习语尽管语言结构与汉语相似，但不同的概念基础使得受试者不管是猜测还是直

译都难以得到正确的答案。第三类习语的得分情况比第四类习语得分情况要好,也是因为其概念基础与汉语一致,有利于习语的理解。其得分显著低于前两类习语,说明即使对于高水平学习者而言,语言层面结构的迁移作用仍不可忽视,但整体的结果表明,母语概念在高水平学习者对二语习语的理解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2) 习语类型对策略使用的影响

关于受试者理解不同习语时所采用的策略,本研究对量表调查的量值进行了均值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

表5 各类习语策略使用的同意度值点均值

Tab. 5 Mean of the degree of agreement in using strategies for all types of idioms

策略类型	T1	T2	T3	T4	T5
S1-3	3.833	3.786	3.625	3.651	3.573
S4-7	3.820	3.770	3.613	3.606	3.699
S8-9	3.453	3.516	3.485	3.383	3.290

注: S表示策略, S1-3为不借助汉语策略, S4-7为借助汉语策略, S8-9为其他。

本量表的量值为1~5分,中性值为3分。从表5可以看出,每种类型习语理解策略的同意度均高于中性值,换算成百分比为72.14%。同意度整体情况较好,说明受试者不管理解哪类习语,都会结合使用多项策略。这与吴旭东^[18]和Cooper^[9]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即受试者会尝试不同的策略去理解习语以确定习语的含义。此外,除了第五类习语(即语言表达相同,概念基础不同的习语),不借助汉语策略(S1-3)的同意度均值均高于借助汉语策略(S4-7)的均值,说明二语者在理解习语时更倾向于先理解习语的字面意义而不是借助汉语,这与本研究选取的习语熟悉度较低有关。对于不熟悉的习语,二语者会先加工习语的字面义;而对于熟悉的习语,高水平二语者往往更容易直接激活习语的比喻义^[22]。针对五类习语,不借助汉语策略的同意度均不低,说明较高水平的英语学习者会适当调用相关英语文化或隐喻来理解习语。五类习语中,第一类和第二类习语不借助汉语策略使用的同意度最高,说明在理解表达和概念均与母语相同的习语时,不直接借助母语为更常用的策略。另外,习语熟悉度低也是其他策略(随意猜测和先前认识该习

语)的同意度相对前面几项策略偏低的原因,大多数受试者对于测试的所有类型的习语都不太熟悉,且受试者不会随意猜测不熟悉的习语。

(3) 理解不同习语时的迁移情况

表5调查结果显示:受试者理解这5类习语时,对于借助汉语(S4-7)策略的同意度均不低,基本达到“比较同意”值点(值点4),这说明受试者在理解英语习语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汉语概念的影响。不过,汉语概念是促进还是干扰英语习语理解,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受试者理解习语的得分情况。本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发现。

(1) 第一类习语和第二类习语平均得分最高,受试者对于借助汉语策略的同意度也最高。大多数受试者在理解语言形式相似或相同且概念基础相同的习语时,发生正迁移,汉语起到促进作用。例如,在理解play with fire(玩火;冒险)、be in hot water(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处于困境)、lose face(丢脸)等此类习语时,由于其语言形式与汉语形式基本或完全相同,概念形式也一致,受试者很容易联想到汉语对应词,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受试者都进行了正确作答。(2) 第四类习语和第五类习语平均得分最低。最有代表性的是在理解win the day(占上风)、pull one's leg(开玩笑)和shoot the breeze(领悟)这几个习语时,大部分受试者都直接填写“赢得了一天”“拖某人的腿”和“射击微风”,与正确答案基本无关。这说明受试者理解概念基础不同的习语时,习惯先一一将习语的字面意义加以翻译,再在汉语中寻找对应表达,而汉语概念与英语概念的差异导致了理解的错误,汉语对受试者的英语理解造成了干扰,产生了负迁移。此外,第四类习语和第五类习语得分虽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第四类习语平均得分相对较低。这可能因为在概念基础不同的情况下,语言形式不同使得受试者更难以借助汉语进行对应,只能靠猜测,这也是识别这类习语的其他策略中对“猜测”同意度最高的原因;(3) 第三类习语得分介于前后四类习语之间。此类习语虽然语言表达形式与汉语形式不同,但背后的英汉概念基础相同,受试者可以通过习语中的某个词直接进行联想,找到英汉之间的相似之处,此时母语概念起到促进作用,发生正迁移。例如,在理解rock the boat(捣乱)时,有不少受试者根据字面意思“晃船”并结合汉语文化猜测习语的

整体意义,而该习语的英汉概念正好相似,都表示“搅动局势”,受试者便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然而,此类习语平均得分不如前两类习语高,说明此类中有的习语得分偏低。例如,在理解 apple of one's eyes (珍爱之物)时,有的受试者直接将其填写为“某人眼里的苹果”。事实上,apple 一词在该习语中不取“苹果”之意,而是指“瞳孔”。眼中的瞳孔是眼睛中最珍贵的部分,因而延伸为像爱护瞳孔一样爱护心爱之物。不少受试者对该习语背后的概念并不熟悉,很难从 apple 和 eye 这两个词直接得到习语的意思,母语概念没有起到促进作用,母语语言形式反而造成了干扰,最终产生了负迁移。还有的受试者正确填写了该习语的意思,因为他们了解 apple 和 eye 的相关典故,没有受到语言形式的干扰,结果同 rock the boat 一样,母语概念促进了习语的理解,产生了正迁移。由此可知,在理解概念基础相同、语言形式不同的习语可能产生正迁移,也可能产生负迁移,取决于母语概念和语言形式对习语理解的影响程度。

三、讨论

本次习语测试和量表调查发现:汉语概念对英语习语的理解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影响,汉语在受试者理解英语习语时起促进或干扰作用。根据相关策略的量表调查结果可知,受试者不管理解哪类习语都会采用多种策略。

(一) 二语习语理解过程中母语的影响和迁移问题

习语虽然由词汇构成,但其意义不完全等同于构成词的意义之和。最早的一语习语理解假说认为,习语的意义整体储存在人脑中,其中 Gibbs 的直通式假说认为习语的习语义可以直接激活,不需要分析字面义^[23]。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这类习语理解模式并不适用,因为二语者对二语习语的熟悉程度远不如母语者,很难直接激活习语的习语义。不少学者认为二语者在理解习语时更倾向于先理解字面义^[24-25]。然而,二语学习者是否能根据字面义得到习语的正确含义还取决于习语透明度这一个重要因素。透明度是指习语字

面义和习语义之间的联系程度^[26]。透明的习语字面义和习语义联系紧密,其语义很容易通过对字面义进行分析得出;相反,模糊的习语语义难以从字面义得出。同样的效应也体现在二语习语理解中,目标语隐喻知识的缺乏使得二语学习者更加无法根据字面义正确理解习语的语义。本研究发现,汉英概念基础相同的习语相对而言更易理解,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发现^[16-17]基本一致。首先,这类习语往往透明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对习语的理解。即使习语义不易从字面义得出,由于习语背后的概念与二语者更熟悉的母语概念相一致,母语在其理解习语的字面义后仍起到促进作用。相比之下,汉英概念基础不同的习语最难理解,尤其是形式和概念基础都不同的习语,这一研究结果也与吴旭东等人的发现^[17]一致。理解这类习语时,二语学习者不管是激活习语的语言形式还是概念,都难以在母语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表达。直接借助母语概念反而会因为与二语概念存在差异导致理解错误。此外,第一类习语和第二类习语得分差异显著而第四类习语和第五类习语得分差异不显著,说明:在概念基础相同的情况下,语言形式对习语的理解会产生一定影响;而当概念基础不同时,语言形式对习语的理解影响不大。学习者虽然可以理解习语的字面义,但由于二语概念知识与母语的不同,二语学习者在理解习语时仍会发生负迁移,这一结果更加说明对于习语习得,母语的作用不单单体现在语言结构上,更多地体现在母语概念上。Kövecse 等指出,大多数习语存在着许多系统概念理据,其本质上是概念性的^[27]。因此,母语和二语概念的差异会干扰习语理解,导致负迁移的产生。本研究还发现,理解概念基础相同、语言形式不同的习语时,不一定如前人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都会产生负迁移^[16]或正迁移^[17],而关键在于二语学习者的隐喻能力。对于有的学习者而言,二语隐喻能力会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即使语言形式与母语不同,他们仍能基于习语的概念基础得到习语语义,达到一定的概念流利。而对于有的学习者而言,英汉概念基础相同并没有弥补目的语相关隐喻概念的缺失。即使概念基础相同,他们也无法做出正确的理解。这类习语得分偏低,说明虽然本研究中参与实验的均为高水

平的二语学习者,但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对英语习语文化内涵了解并不多。这体现了目前国内在习语教学上存在的不足。

(二) 二语习语理解过程中的策略使用

习语类型即汉英语言形式和概念的相同或不同影响习语理解策略的使用,习语熟悉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习语理解策略的选择。首先,按照Gibbs等提出的习语分解假说,大多数习语的语义是可分析或可分解的^[28]。再者,本研究中习语的熟悉度均偏低,如果受试者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习语,一般会先解构习语的字面意义,在发现意义不通顺后才会考虑使用其他策略。因此,对于大多数习语,受试者对不借助汉语策略进行理解的同意度最高。对于语言形式与母语相同或相似的习语,受试者一般不会直接借助汉语,因为针对这类习语,直接理解习语每个词的意义,再检索对应的汉语概念就可以得出习语的整体意义。对于第五类语言形式与母语相同而概念基础不同的习语,受试者在进行字对字翻译后发现习语的字面义与整体义之间关联不大,此时受试者会转而去汉语中检索类似的表达,因此此类习语借助汉语策略的同意度更高。然而,对于语言形式与母语不同的习语,有的受试者会直接借助汉语隐喻,因为其对习语背后的英语文化内涵比较生疏,而有的受试者则会借助英语文化或联想相关知识来进行理解。这一结果反映了二语水平相近的受试者之间对目标语文化概念了解程度的差异。总之,不管理解何种类型的习语,二语学习者一般都会先判断习语的字面意义对整体意义的贡献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推断,具体采取何种策略则取决于习语背后汉英概念的差异程度、受试者的联想能力、受试者的知识文化储备等因素。习语语义的理解反映了学习者的隐喻能力,而这一能力实际上就是学习者恰当利用自身内外部资源来理解非字面意义能力的体现^[18],因为只有理解了习语的非字面意义,才能真正理解习语的语义。

四、结语

本研究采用测试和量表调查法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不同类型英语习语的理解情况以及采用

的相应理解策略,得出汉语概念会影响英语习语理解的结论:理解概念基础相同、语言形式相同或相似的习语时会产生正迁移;理解概念基础相同但语言形式不同的习语时可能会产生正迁移,也可能会产生负迁移;理解概念基础不同、语言形式相同、相似或不同的习语时会产生负迁移。影响习语理解的因素有很多,受试者在理解习语时会先后采用多种策略,但不论理解什么类型的习语,他们总是会先尝试理解习语的字面义。

意义对于习语来说至关重要,习语意义是一个整体,不是单个词意义的相加。虽然透明度高的习语整体义易从字面义推导而来,但英语学习者不能过度依赖习语的字面义,这不仅因为英语习语中透明度低的占多数,还因为习语的形成往往是由某一团体最先使用,而后将形式与意义结合才能广为接受,在接受这一表达形式时,人们往往会忽略构成词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因此,二语学习者应多了解目的语的文化内涵,以更好地掌握习语背后的概念基础。教师在今后的习语教学中,除了关注习语的语言形式,还要重视学生隐喻能力的培养。学习者加强对目标语文化的学习,有助于更好地掌握习语,将形式与意义匹配形成构式,从而进一步提高二语水平。此外,学习者掌握一定的迁移规律,也能尽可能地减少二语习得过程中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FERNANDO C. Idioms and Idiomatici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ABEL B. English idioms in the first language and second language lexicon: a dual representation approach[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3, 19(4): 329 - 358.
- [3] KROLL J F, STEWART E. Category interference in translation and picture naming: evidence for asymmetric connections between bilingual memory representations[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4, 33(2): 149 - 174.
- [4] ODLIN T. Language Transf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5] 王初明. 解释二语习得, 连接论优于普遍语法[J]. *外国语*, 2001(5): 11 - 17.
- [6] IRUJO S. Don't put your leg in your mouth: transfer in

- the acquisition of idioms in a second language[C]// Proceedings of Bos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Boston, 1984.
- [7] IRUJO S. Steering clear: avoidance in the production of idiom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1993, 31(3): 205 – 220.
- [8] LAUFER B. Avoidance of idioms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effect of L1-L2 degree of similarity[J]. *Studia Linguistica*, 2000, 54(2): 186 – 196.
- [9] COOPER T C. Processing of idioms by L2 learners of English[J]. *TESOL Quarterly*, 1999, 33(2): 233 – 262.
- [10] NESSELHAUF N. The use of collocations by advanced learners of English and some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3, 24(2): 223 – 242.
- [11] TAKI S. The role of L1 in L2 idiom comprehension[J].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3, 4(4): 824 – 833.
- [12] CARROL G, CONKLIN K, GYLLSTAD H. Found in transl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L1 on the reading of idioms in a L2[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16, 38(3): 403 – 443.
- [13] CARROL G, CONKLIN K. Cross language lexical priming extends to formulaic units: evidence from eye-tracking suggests that this idea “has legs” [J].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017, 20(2): 299 – 317.
- [14] TÜRKER E. Idiom acquisition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he influence of cross-linguistic similarity and context[J]. *The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2019, 47(2): 133 – 144.
- [15] VAN DIJK D, VOGELS J, DE VRIES M. Interpreting idioms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role of context and transfer in interpreting English idioms by native Dutch speakers[J].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2022, 39(1): 55 – 71.
- [16] 林维燕. 什么影响着我们对英语成语的理解?——关于文化差异和母语作用的实验调查报告[J]. *国外外语教学*, 2003(4): 34 – 37.
- [17] 吴旭东, 陈斌, 黄丽辉. 中国学生对英语习语的理解: 习语类型与二语水平的作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 38(3): 196 – 201.
- [18] 吴旭东. 习语类型和二语水平对习语理解策略使用的影响[J]. *现代外语*, 2014, 37(1): 62 – 73; 146.
- [19] 唐玲. 中国大学生英语习语理解策略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09(2): 10 – 16.
- [20] 叶琳. 英汉习语理解模式及使用策略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 [21] 谭利思. 英语习语的理解策略[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7(2): 68 – 70.
- [22] 周英, 张淑静. 英语专业学生英语习语加工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 34(1): 46 – 51.
- [23] GIBBS R W. Spilling the beans on understanding and memory for idioms in conversation[J]. *Memory & Cognition*, 1980, 8(2): 149 – 156.
- [24] KECSKÉS I. A cognitive-pragmatic approach to situation-bound utterance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0, 32(5): 605 – 625.
- [25] LIONTAS J. Context and idiom understanding in second languages[J]. *EUROSLA Yearbook*, 2002, 2(1): 155 – 185.
- [26] CAIN K, OAKHILL J, LEMMON K.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reading comprehension level and their comprehension of idiom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005, 90(1): 65 – 87.
- [27] KÖVECSES Z, SZABCÓ P. Idioms: a view from cognitive semantics[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6, 17(3): 326 – 355.
- [28] GIBBS R W, NAYAK N P. Psycholinguistic studies on the syntactic behavior of idioms[J]. *Cognitive Psychology*, 1989, 21(1): 100 – 138.

(责编: 朱渭波)